

国人。他战后去了澳大利亚，最后把片子给了堪培拉的电影档案馆。于是我去那里做了一份 VHS 拷贝。后来我们要用那些原版，档案馆也很帮忙地寄过来了。我们再把原版翻成 16 毫米。这个过程让人非常头疼。原版的片子有不少破损，我们复制时做了许多修补工作。处理之后，就比原来的好多了。

我们也用了日本军方的宣传片，里头有不少虹口的街景。宣传片是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找到的。我想是美国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弄到的。华盛顿那儿有不少好东西。

问：你的纪录片和许多难民回忆录一样，从中很难看出犹太人和本地的中国人有什么交流。他们之间很明显地存在着一种距离，你是怎么看这种“距离”的？

答：首先我觉得，有语言才有交流。中国人不说德语也不说英语，欧洲难民又不说汉语。另外，由于担心染病，许



影片导演琼·格罗斯曼与保尔·罗斯迪

多年轻难民都被他们的父母关在家里。中国居民的免疫系统已适应了上海的饮食起居，可欧洲人还不行。许多难民一不当心就生病死了。犹太难民和中国人都很穷，这也是一个沟通障碍。但他们还是有一些接触和交流。你能从影片里看到一点儿的。像西格马·西蒙，他在大街上卖苦力。还有 A.J. 斯托弗和他的《黄报》。在我看来，这份报纸是移民社区中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。要知道，那是一个被战争和绝望笼罩的年代。

需要澄清的是，难民没有把上海当作可以开创新生活的目的地。他们大多把上海看成是一个中转站，在此等候美国的签证。他们没有想到会在上海耗掉十年，没想到会有珍珠港事件。如此等等，都在意料之外。他们始终在等待，在努力求生。

问：拍摄时有什么文字材料做参考么？

答：戴维·克兰茨勒的著作是这方面的必读书。此外还有当时的报纸，加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。当然，少不了《黄报》。我在 1999 年把它们重印出版了。

问：找赞助有难度么？赞助你的 HBO 和 ORF 有无提出过什么要求和限制？

答：是花了点儿工夫。给电影找赞助总是一件难事，可最终还是成了。我们事先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，给赞助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赞助方没有任何形式的限制。只是做成宣传片，无论政治的还是商业的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那是不会受欢迎的。关键是要挖掘出史实，用相应的电影手法表现出来。你得确保作品的真实、可信。真要说有什么限制和要求的话，我想就是不要作假，不要移花接木，不要戏说。

问：片子拍完有什么遗憾么？

答：有的。我们想在上海放映这部影片，可看来没什么机会。上海电影节方面不愿意放，理由是他们不接受纪录片。我想，让中国观众在中国影院里看这部片子会很有意思的。R